

反對派極端思維蒙蔽良知

□姜桂興



10月1日本港發生南丫島大海難39人罹難，在全城哀痛、舉世震驚之際，一些反對派政治人物卻對中央駐港機構的關心慰問和支持橫加指責，其「港獨」思維完全蒙蔽了人應有的良知。

泛政治化衝擊道德底線

一、中央駐港機構的行為合情合理合法，無可指責。南丫島大海難發生後，國家領導人胡錦濤、溫家寶、習近平作出重要批示，指示特區政府要全力做好失蹤人員搜救、受傷人員救治及其家屬的撫慰等工作，要求國務院港澳辦、中央駐港聯絡辦、交通運輸部及其海上搜救中心等部門全力配合香港特區政府做好有關工作，提供所需的一切協助，並對遇難者家屬和受傷人員表示親切慰問。中聯辦作為中央政府在港的派出機構，其負責人代表中央政府到醫院探望海難受傷者，並與廣東省有關部門聯絡以使廣東方面盡速派出打撈船舶協助特區政府。這些舉措既合乎人倫道德，也完全遵守基本法，對「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沒有造成絲毫傷害，不但無可指責而且值得高度讚許。

二、反對派凡事泛政治化、陰謀論，已喪失了基本的政治倫理。香港政治勢力複雜多樣、政治主張各不相同、政治鬥爭尖銳複雜，在政治乃至民生議題上出現不同的聲音是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但是，任何政治勢力和政治人物都必須遵守社會公認的政治倫理，要有善良之心、要尊重生命，不能突破社會公眾能夠接受的道德底線。對於這次南丫島大海難，一些反對派人士的言論實在讓人側目，例如：反對派的馬前卒、反對國民教育的急先鋒、學民思潮召集人在海難發生後即刻在個人facebook留言，竟稱

「梁振英去了海怡，可惜我不在家」，意指如他在家，就要到海怡向特首梁振英示威。在他心目中，30多條人命並不重要，影響救援工作也不重要，惟有示威才最重要。在全城悲哀之際，反對派打手游清源對特首梁振英在事後指導救援、慰問傷者等行為冷言嘲諷，稱梁振英是在「發死人財」、「玩水屍」，甚至莫名其妙地稱南丫島大海難是因為特區政府早上趕走幾名學民思潮成員而導致的，甚至預言香港將來會「屍橫遍野」。其惡毒言論完全不顧基本的科學常識，更違背了起碼的倫理道德，實在令人齒寒。

潛藏「港獨」思維日漸外露

三、一些反對派人士昧於現實、違背人倫的根本原因是「港獨」思維作祟。香港回歸祖國以來，隨着國家的飛速發展，隨着香港與內地的交流交往和經濟融合進一步加速，一些喝英美奶水長大的反對派政治人物焦慮感急劇上升，潛藏的「港獨」思維日漸外露。從「五區公投」、「港珠澳大橋環評案」到反對新界東北部發展計劃均是這種「港獨」思維的表現。最近一些反對派人士變本加厲，在「十一」國慶節當天，明目張膽地打出港英殖民時代的「龍獅旗」到中聯辦門外挑釁，叫囂「中國人滾回中國去」、「香港要獨立」、「香港感謝英國」等口號。此後，反對派喉舌「蘋果日報」又對中聯辦負責人探望海難受傷人員和聯絡廣東省方面派打撈船協助特區政府進行無理指責，誣稱「高調插手港政務」、「破壞一國兩制」，聲稱香港發生海難「與中聯辦有關」。

一些反對派政治人物「港獨」思維作祟導致良知泯滅、胡言亂語實為令人憤憤之事，香港市民應該對其保持高度警惕並奮起聲討之。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理性對待國民教育科

□謝緯武

「民間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要求特首宣布撤科，同時要取消國教科課程配套，否則就是「漠視民意」，又要包圍立法會，到政府總部示威，不排除再次搞絕食抗議。筆者注意到反對國教者的相關言論及支持反國教的一些學人、專業人士所發出的某些反國教的理論觀點，試作點理性思考來回應。

有位政治公關專業人士為反國教提供這樣的「理論基礎」：中華民族「這個共同體，在過去以千計的歲月中，其實並沒有『國家』這個觀念」。中國人既然以千計歲月沒有國家觀念，而非因香港遭一百多年殖民統治而致香港中國人國家觀念淡泊，何需國民教育？

理性的回答是：遠離歷史，不符合歷史，扭曲歷史。

當今世界是民族世界，3000個民族分布在200多個國家和地區，絕大多數國家由多民族組成，單一民族國家極少。但幾乎沒有民族不單獨或與其他民族共同形成國家，因為國家主要職能之一是保護民族生存和發展。中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現今由56個民族共同形成。

中華民族的形成有一個過程，但這個民族的主體或前身的「華夏」人，早就自稱中國人，早就有強烈的「中國」的國家觀念。

「中國」的本義是「天下中心」。中國自古以來，具體地講自夏代開始，就認為自己國家處於天下中心。《尚書·大禹謨》：「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尚書·周書·梓材》首見「中國」一詞：「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於先王。」西周初

年的《何尊》銘文：「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上天曰：余其宅茲中國，自之辭氏。」所以「中國」一詞的本義，是講地理位置上處於「天下之中」的國家。《詩經·大雅·民勞》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國家位四方之中，世界之中。

政府不可能宣布撤科

「中國」既指「天下中心」，亦指「文化中心」。漢代揚雄道：「孰為中國？曰：王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為中國。」

「中國」一詞一出現，便有國家的含義。作為國家名稱，核心在一個「中」字。這既反映中國人自古以來存在「天下中心」和「文化中心」觀念，同時也有一大統的國家觀念和正統名稱。所以在中國歷史上，直到現在（以至將來），歷代統一王朝或共和國號稱謂雖有不同，但無不以「中國」相稱。「一個中國」，是現代統一國家的一條原則，香港、澳門、台灣和大陸，都屬「中國」範圍。中國人無國家觀念，香港人在中國人範疇之外，香港特區不屬中國中央政府直轄下的地區，香港公民不是中國國民，香港人（包括青少年學生）不接受中國國民教育，真是匪夷所思，荒誕離奇！

在憲法和基本法的法治之下，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行政長官不可能宣布撤銷國民教育科。社會要討論的不是撤不撤科，而是如何逐步準確、豐富、完善該科內容。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擱置情可原 國教不可廢

□李昌鎬

沒有「指引」的國民教育，仍然可以以其他不同形式推動，加強兩地學校、教師、教育團體的溝通、交流，促進香港師生對中國國情與歷史的了解，無疑是一個正確方法。在此方面政府切不可「擱置」為名，擅自削減此方面的資助，否則將會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失。



無論用什麼字眼來形容都好，所謂的「擱置」國民教育課程指引，實際上與「撤回」、「撤銷」沒有任何差別。原以為政府會採取更加有智慧的方法處理此項爭議，但結果難免令人失望。但無論如何，如果一項政府決定，能夠平息社會爭議，自有其推出的理由和價值，應當予以基本的尊重。然而，作為特區政府，在「擱置」一項重大政策的同時，是否也應該以更長遠的眼光，就如何推動國民教育採取更負責任的態度？畢竟，國民教育若沒有政府的角色，將來只有萎縮而不可能有正面的發展。

當然，筆者相信，出現如此結果，也非包括特首梁振英在內的特區政府所希望看到的。事實上，從七月一日至今的三個月時間裡，新一屆政府的確努力貫徹上屆政府的政策，並在原有基礎上盡力做好解釋與推動工作，成立了推進委員會廣泛吸納各界意見，工作不容否定。但無奈形勢比人強，一如學者所言，當前的政治生態已經大變，以往認為沒有問題的政策，到了實際推動過程，又會衍生意想不到的變故。而當香港社會出現巨大的爭議時，甚至演變成對政府的信任危機，作為一個以民為本的政府，應當權衡利弊，及時回應避免問題不斷擴大，進而影響大局。

適應形勢 完善配套

但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固然可以因應時勢而調整政策，但一些根本性的大政策方向，卻不能夠說變就變。在國民教育科一事上，並非沒有更佳的方法，也不一定需要弄到如今「威信盡失」的局面。除了「擱置」這一簡單的回應性的表述以外，是否有更多相應的配套做法？比如，在強調國民教育的「必須」性的時候，是否應當表明政府在推動國民教育的立場？實際上，綜觀委員會昨日發出的所謂「聲明」，逾千字中不斷為「擱置」決定作辯護，但當中卻沒有一字提及日後政府會如何推動國民教育。一方面強調國教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無計可施、無可奈何，這又如何能體現政府的擔當？

實際上，該科的課程指引的存在與否，本身的存在與否已無關宏旨，僅僅是一個象徵意義，即象徵政府對國民教育的責任，以及在「一國兩制」下特區政府的存在。連如此毫無實際影響力的指引也要完全取消，說明了什麼問題？顯然，

成員，其失望、失落的心情，可能需要很長一段時間才能回復。

問題已非該科本身，而成為意識形態之爭，在某些人的操作下，而像是一種「政治攻勢」，對政府執政能力的攻擊。如果認識及此，對於所謂的「擱置」指引決定，就不應如此毫無保留地一撤再撤。

深層矛盾 不可迴避

如果按政府及委員會的說法，德育、國民及公民教育是學校教育中重要的一環，並認為全人發展應包括對國家的認識、國民身份的認同，以及對社會多元包容的核心價值的認知。因此，認同學生接受德育、國民和公民教育是理所當然之事。既然是「理所當然」，而當前情況又是眾所周知的「極度缺乏」，那麼，政府在此方面是否應當有所作為？僅僅一個「擱置」固然可解一時之困，但要解決深層次問題，國民教育又豈能碰都不碰？

誠然，一如胡紅玉所言，有關國民教育的爭議，不單造成分化和衝擊，更對學校運作和教學造成負面影響，這是教育界、家長和社會不願見到的情況。昨日委員會在聲明中說，希望透過理性討論，尋求共識，消解不必要的爭論，亦希望能平息爭拗，重建社會上的互信，好讓辦學團體和學校能在安靜的環境中，專業自決教育的方法，以培育學生的全人發展。這些都是再正確不過的事實，也沒有人會反對，但筆者想在這裡強調的是，無論撤銷抑或擱置，如果政府仍然堅信國民教育的重要性，那麼就應當有相應的措施去推行。

實際上，沒有「指引」的國民教育，仍然可以以其他不同形式推動，加強兩地學校、教師、教育團體的溝通、交流，促進香港師生對中國國情與歷史的了解，無疑是一個正確方法。在此方面政府切不可「擱置」為名，擅自削減此方面的資助，否則將會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失。

顧全大局 權衡利弊

雖然沒有詳細的會議紀錄公布，但在得出這一所謂的「共識」之前，相信委員會內部一定經過非常激烈的辯論。因為儘管最後沒有用「撤銷」或「撤回」的字眼，實際上眼前這個所謂的「擱置」用語，等同判定國民教育科於死刑，甚至是「永不超生」。至此，這項經過回歸十五年來各方面的努力、兩國政府的付出的國民教育科，雖然僥倖免於「難產」，最終還是難逃被扼殺於搖籃的結局。而那些從一開始就大力支持政府的教育界人士、學校、教師、學者，乃至委員會

馬排兵布陣苦心改「閣」

□蘇虹 何溢誠



馬英九在經歷四年多苦撐待變後，最近終於放開手腳，大刀闊斧地改組兩岸、「國安」、外事，並寄希望任用的「親信」能秉承自己的意志，貫徹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大刀闊斧 親信遍布

上月中，台「總統府」副秘書長羅智強逐一與各大報紙高層「吹風」，拉開了馬改組「內閣」的序幕。

海基會負有兩岸談判、協商、協議簽署的重任。其年逾八旬的董事長丙坤功成身退辭職獲准，遺缺由曾任「行政院」及國民黨秘書長、嫻熟「政府」各「部會」、黨政運作體系的國民黨秘書長林中森接任。

陸委會是「行政院」轄屬的政府機構，對大陸、香港、澳門的官方對口機關。這次陸委會調整中，接替賴幸媛出任陸委會主委的乃是有着「馬分身」之稱的王郁琦。在「國安」系統中，「國安會秘書長」人選最為關鍵。馬英九2008年上任後，就啓用其最親密的「哥們」蘇起任「國安會秘書長」。蘇起由於美牛案而折損下台，遺缺則由國民黨名將胡宗南之子、年歲已大的胡為真「過渡」。這次馬選中國民黨重要的

「外交官」、「駐美代表」袁健生接任。

在外事系統中，這次人事調整比較複雜。現任「外交部長」楊進添轉任「總統府秘書長」，遺缺由「駐歐盟代表」林永樂擔任，馬英九最信任的心腹金溥聰接替袁健生成為「駐美代表」，曾永權由「總統府秘書長」職位轉任國民黨秘書長。

馬這次對兩岸、國安、外交的人事調整，有兩個顯著特點：

一是任人唯親。關鍵崗位上，任用的幾乎全是馬英九的鐵桿親信。金溥聰在馬眼裡，幾乎可以用「絕對信任的人」來形容。有人比喻很像日本漫畫《聖堂教父》裡的兩位主角淺見千秋與北條彰，一個站在陽光下從政，拿下政權，一個站在黑暗裡，不計手段支持對方。而繼任陸委會主委的乃金的徒弟，有「馬分身」之說的王郁琦。其他要害部門的職務，無一不是馬的親信。

二是用其所長。由於目前兩岸已簽署多項協議，今後兩會商談需要具體、專業地對接，也將更重視相關單位主事者溝通、協調，故遴選熟悉黨政運作的林中森扮演非常具有功能性的角色可謂「量身定做」。「馬大腦」金溥聰接掌駐美代表，可以精確傳達馬意志，積極推動《台美貿易暨投資框架協議》(TIFA)與《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袁建生由駐美代表轉任「國安會」秘書長，更利便與美情資溝通和情報交換。王郁琦乃金的徒弟，師傅在美國遙控徒弟大陸政策，兩岸關係的執行速度與力度，落實馬要大幅翻修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指令，俾令其合乎時節，與時俱進。

此次改「閣」體現出馬英九今後政策走向的一大特點，即「和陸」、「親美」。

由於「兩岸」關係在台灣政治生態中極為敏感，此次王郁琦掌陸會，主要是貫徹馬意志，「加大油門」，大幅翻修規範兩岸關係的「母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為兩岸交流協商的深化掃除不合時宜的制度性障礙。

政策取向 「和陸」「親美」

台美關係在馬英九的「路線圖」中有着至關重要的指標。金溥聰原本希望在今年「總統」大選後淡出政治，但馬仍希望金溥聰能發揮長才為執政團隊服務、深化台美高層互信，故決定「派『換帖兄弟』向美輸誠」。在美方看來，金是最能貼切精準反映馬政策的人，自然樂見。其曾在約翰霍普金斯擔任一年的訪問學者與美政府智庫專家亦多有交集，出任駐美代表有利於重啓 TIFA 與 TPP 磋商會議，有利於軍售這一持續性議題，同時，也有利於美國重返亞太戰略布局中台灣地位的鞏固。

但此次人事安排也遭黨內反彈，有人稱「看不懂馬的意思」；林中森並非兩岸系統出身；金溥聰缺乏「外交」歷練和專業背景；上任才短短兩三天，王郁琦，更飽受揶揄與批評。因此，此番馬英九苦心孤詣的人事調整，能否不負重託，實踐其政策，仍有待政績佐證。

(蘇虹，博士；何溢誠，復旦大學台籍博士生，國民黨中央委員)

公用事業加價難過民粹關

「黑心」政客

黃牛



公用事業的加價申請從來都是備受爭議，公用事業因服務對象是普羅大眾，而在選擇上市民又沒有多大的討價還價空間，所以公用事業加費就顯得非同尋常。因為無論加價的理據和幅度如何，加價的結果都是要服務對象多付鈔票，注定不會得到市民的認同。這個情況在公務員加薪上也屢見不鮮，原因是公務員加薪意味著政府要多花開支，本來可以退稅的金額也少了，市民自然會有意見；另一個類似的例子是外籍家庭傭工的加薪，即使外傭的加薪幅度不大，但僱主往往會牢騷滿腹。當一方的利益和另一方形成對立時，往往就是社會爭議的源頭。

對合理回報無社會共識

公用事業每年加價的原因，除了是成本增加之外，更多的是大多公用事業都是上市企業，它們要向股東負責，自然要在收費上不能不理股東利益。所以，在定義上，公用事業就是為富不仁的化身，既然公用事業可以有相當壟斷性，而且又有不俗的盈利，加價當然是冒天下之大不韙，也絕對是不討好的事。

可是在這種思維的背後，是看到人家賺錢而覺得不合理，反而對公用事業的盈利水平和營運目標卻乏人問津，反對之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條件反射式的行為。公用事業要為市民服務，營運商也需要取得一個合理的回報，這點相信大家都會明白，否則就沒有商人有興趣經營公用事業。可是，如何制定公用事業的合理回報水平，卻是沒有社會共識。一個很常被引用的例子，就是港鐵去年大賺一百四十七億元還要加價，結果被人批評得體無完膚。然而，卻沒有多少人去為港鐵算算帳。港鐵的資產總值幾近二百億元，以這樣龐大的資產投入，獲利一百四十七億元以絕對值來算自然是不低，但資產回報率只有7.4%，在香港上市公司當中並非特別吸引。

對經營商來說，絕對值的盈利水平是現金流的代表，當然是重要數據。可是回報率代表其投資成果，以相同的項目，經營商大可將之用作其他回報更高的項目，而且在融資上，金融機構看重的也是財務比率，當絕對值與財務比率合併在一起時，往往公用事業的獲利就變得不是人們口中常說的厚利。

加價訴求難作理性討論

對市民來說，他們不會對這些數字分析有興趣，他們只是從切身感受來理解公用事業的加費，自然不能在理性討論的環境下對公用事業加價作出客觀評價。而且更令人感到不安的是，民意和輿論在報道公用事業加價時，都是以主觀的感性情緒來駁斥加價訴求，至於公用事業加價的來龍去脈，卻是無人理會。

在這種情況下，筆者不是說公用事業加價有理，而是在道出香港現時的一個現象，就是凡事都以主觀訴求來代替以理服人，民意是如此；報章輿論是如此；連立法會議員也是如此。未來公共事業會一個接着一個申請加價，在現時的氣氛環境下，相信民意會一面倒反對，而政府作為公用事業的監管者，就注定會備受監督不力的指責。因為政府講求做事公平，政府不能只要求公用事業提供高質服務而沒有回報，只要政府容許公用事業加價，那怕是一毫幾仙，政府都會是眾矢之的。

作者為恒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